

■ 李帆 / 主编

民國思想文叢

郭丽徐

【乡

建设派

】

長春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李 帆 / 主 编

民國思想文叢



「设派」

徐 娜 编

長春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乡村建设派 / 郭丽, 徐娜编. —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13.1

(民国思想文丛)

ISBN 978-7-5445-2652-4

I. ①乡... II. ①郭... ②徐... III. ①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民国
IV. ①D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97987 号

乡村建设派

编 者: 郭 丽 徐 娜

责任编辑: 张耀民 胡 新

封面设计: 大 熊

出版发行: **长春出版社**

总编室电话: 0431-88563443

发行部电话: 0431-88561180

邮购零售电话: 0431-88561177

地 址: 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 编: 130061

网 址: www.cccbbs.net

制 版: 吉林省久慧文化有限公司

印 刷: 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508 千字

印 张: 27.5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3.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 0431-87997924

编辑说明

本集主要收录反映民国时期无政府主义者的基本思想主张的文章和专著；翻译文章及介绍性的文章没有收入。

本集所收录的资料主要来自当时国内出版的各种报刊杂志、专著和文集，以及1949年后所编辑的文集。

为了保持原貌，本集所收录的资料，均按原文照录，其中个别文章的标题由编者所加；标点符号均统一为新式标点；个别篇目有所删节，以省略号标出；文中凡有损坏、缺漏或字迹不清者，以□号表示；正字均以〔 〕标明；每篇文章之后注明出处和发表年月；有的文章录自相关文集，初刊时间无从查考，则暂从文集出版年月。

编 者

总 序

思想如何分类，向来是个难题。从古至今，人类思想呈现多姿多彩的面貌，每一种思想皆各有主旨，各具风采，特色鲜明，或可名之曰“家”，或可名之曰“派”，晚近则有“流派”之名。

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有两个时期最引人注目，一个是先秦时期，一个是中华民国时期。先秦自不必说，诸子百家，各显其能，争鸣不已，异彩纷呈，形成中国思想史上的“轴心时代”，影响及于后世两千余年。民国思想虽未能再现“百家争鸣”的胜景，但亦具有明显的多元文化特征，思想家群体和思想流派甚多，思想文化论战此起彼伏，思想交锋异常激烈和复杂，而且实现了对中国固有思想传统的实质性的挑战与超越，形成一些新的思想、学说体系，整个思想界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之所以如此，既在于晚清以来西学的大举进入，西方思想、学说与中国固有观念、学问的碰撞、交融，已使得相对单一的中国传统思想体系遭到极大冲击，乃至近于分崩离析，从而为民国时期多元思想、文化格局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又在于形成于清末、壮大于民国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尤其是清末民初派遣出国的留学生在民国年间纷纷回国，成为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中坚力量。所受教育的差异以及与各类集团、群体、势力的不同关联，使得他们形成相异的思想、文化理念，在当时各种矛盾纠葛交织的时代环境下，往往就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问题提出自身旗帜鲜明的主张，并引发激烈、复杂的论战与斗争；也在于民国北洋政府，尤其是后来的国民政府尽管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但因各种原因，还是给予思想家和学者一定的自由活动空间，允许各种思想观念、主张并存而且彼此展开争论；还在于民国时期社会空间的相

对扩大，如大学、研究院等学术机构的建立与迅速发展，报刊、出版业的极大发达，社会舆论的相对自由，等等，为思想界精英结合成志趣相投的群体、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主张提供了社会条件和现实可能性。正是在这些因素下，民国思想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座高峰。

作为思想繁荣的表征之一，便是民国时期出现思想家群体和流派众多的景象。这些群体和流派主要分布在政治思想、文化思想、学术思想领域，此外在经济思想、社会思想、教育思想、科技思想内部也不乏各种流派。不同流派的思想家主张各异，或趋近于民族主义，或趋近于激进主义，或趋近于自由主义，或趋近于保守主义，不一而足；而且延续的时间也长短不一，有的起步于清末，进入民国后发扬光大，绵延数十载，有的仅在北洋政府时期或国民政府时期昙花一现，数年后无果而终。由于流派是个不易界定的概念，大家对之的认知不同，于是人们所认定的思想流派的存在方式也不全然一致，有的依托于同人报刊或出版物而存在，甚至一个刊物就会造就一个流派，如甲寅派、新文化派（或称新青年派）、现代评论派、学衡派、古史辨派、醒狮派、新月派、独立评论派、战国策派、观察派等；有的依托于某一机构、团体或党派而存在，如所谓北大派、南高派，以及乡村建设派、国家主义派等；有的仅仅因为主张趋同而被视为一派，如无政府主义派、科学派、玄学派、西化派、文化保守派等。就流派的划分界定而言，这些“派”并非完全处在同一层次，其中既有角度、性质之别，又有大小之分，还有人员、主张等的多重交叉，甚至是派中有派，如认同传统的文化保守派中又有东方文化派、本位文化派、现代新儒家等不同的思想派别存在。由于思想流派众多，思想文化论争也因而接连不断，如民国初年的孔教之争，“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之争、白话与文言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五四”之后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等等。故而民国时期成为继先秦之后，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论争最多的一个时期。

通过发布并实践自身的主张，这些流派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让国人听到了思想家们独到的声音。而且这样的声音在争鸣中成长壮大，日臻成熟，自成一体。无论其主张如何相左，但整体而言，大抵皆对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和整个国家走上富强之路，从各自立场发挥了思想支撑和引

引领作用，并为今天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

从民国思想史的研究状况看，学术界对这些流派虽有所研究，特别是对一些重要派中人，如刘师复、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吴宓、梅光迪、柳诒徵、顾颉刚、张君勱、曾琦、李璜、梁漱溟、晏阳初、张奚若、罗隆基、梁实秋、雷海宗、林同济等，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整体而言，非常不乐观，不仅是某些流派未被全面系统的探讨过，而且有些派中人乏人问津，形成不少学术空白点。这一情形的出现，与多种主客观因素相关，如问题意识的局限、一流之外的思想家不被重视等，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原始文献资料的缺乏系统整理，导致研究者无从着手或着手不易，从而知难而退。近年来，出版界虽推出了不少关于近代中国思想方面的文献资料集，不过总体而言，这些资料集重晚清轻民国，晚清思想资料的出版蔚为大观，系统性颇强；而民国思想资料的出版则相对不足，尽管已有一批思想家的个人全集、文集、选集等陆续出版，也有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汇编一类的书先后面世，但存在着要么过于分散、要么过于笼统的弊端，针对民国思想特点而编的特色性资料集不多，如以思想流派作为归类的文献资料集就尚属空白。所以，以“民国思想文丛”之名系统整理出版民国思想的文献，显然是极为必要的，既能克服已有出版物或分散、或笼统的弊端，又能体现民国时期思想流派众多这一思想史特色。对于研究者来说，“民国思想流派文丛”可为其研究民国思想流派史提供一份基本资料，为其研究派中人物提供一个基本语境；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执一卷在手则知一派，可作为进入丰富多彩的民国思想世界的原始读本，以此为起点，集腋成裘，就能进而了解民国思想史的整体面貌。

由于民国思想流派众多，一时难以穷尽，所以这套文丛首先选取当时在政治思想、文化思想和学术思想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无政府主义派、新文化派、学衡派、古史辨派、国家主义派、乡村建设派、现代评论派、新月人权派、战国策派的基本文献编入，其他流派只能俟诸他日。在编排结构上，每派一集（现代评论派与新月人权派的思想主张和存在时间都相近，故合为一集），每集内部以人物为单位编辑文献，挑选该人最能代表该派思想的论说编入，每篇文献后注明出处。各集编排顺序如下：编辑说明、流派介绍、文献汇编、参考文献。其中数万字的“流派介

绍”，主要是简要介绍该集所涉流派的基本情况、人物生平、思想主张、时代影响等，以使读者对该派思想有个初步的了解和认识，由于各派情况有异，故在写法上各集可能略有不同；“参考文献”则在提供该派文献之出处的同时，列出可扩展阅读的论著目录，以方便意欲进一步探索的读者。

选编这样一套经典性的近现代思想文献，不论对谁都是个巨大的挑战，我们深知力有不逮，舛错失误在所难免。还望方家不吝赐教，以利将来修订完善！

此外，本丛书中收录的某些文章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及时与作者家属或后人取得联系，望有了解此类情况者及时与编者联系，在此谨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李 帆

2012年11月于北京师范大学

目 录

乡村建设派评介 / 1

米迪刚 / 16

要旨及正误 / 16

农村与民治主义及一切政治之关系 / 18

农村家族制度与社会改良 / 20

农村自治应兴应革之特别要点与社会进化之将来 / 25

移民实边之必要及新农村组织图说 / 31

王鸿一 / 40

建设村本政治 / 40

三十年来衷怀所志之自剖 / 44

中国民族之精神及今后之出路 / 48

青年之出路 / 53

尹仲材 / 59

翟城村前论 / 59

十八年间各地村治工作访问录 / 65

梁漱溟 / 75

乡村建设运动由何而起? / 75

乡村组织要以中国的老道理为根本精神 / 86

村学乡学组织之内容配置及其运用 / 93

吕振羽 / 106

乡村自治问题 (上) / 106

乡村自治问题 (下) / 119

彭禹廷 / 126

在区村长大会上的演讲词 / 126

对乡村小学教师的演讲 / 134

对第三期训练之干部人员讲话 / 141

茹春浦 / 147

村治之理论与实质 / 147

实行村治的初步计划 / 156

陶行知 / 166

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 / 166

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答客问 / 169

中国乡村教育运动之一斑

——中国代表致送坎拿大教育会议报告之一 / 173

晓庄试验乡村师范的第一年 / 180

第二年的晓庄 / 183

晓庄三岁敬告同志书 / 185

乡村工学团试验初步计划说明书 / 190

张宗麟 / 193

乡村教师的使命 / 195

几种办乡村师范的类型 / 196

乡村社会教育运动 / 205

赵叔愚 / 213

教育革命与革命教育 / 213

农民训练的理论与方法 / 222

晏阳初 / 231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工作大概 / 231

关于民众教育的任务 / 234

乡村运动成功的基本条件 / 236

农村运动的使命及其实施的方法与步骤 / 237

中国农村教育与农村建设问题 / 244

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演进的几个阶段 / 246

农村建设要义 / 250

中国乡建运动的重心 / 266

瞿菊农 / 267

力量的培养 / 267

平民化与生产化的教育 / 269

“人”的基础 / 274

县政建设的实验 / 276	
从定县实验中得到的教育看法 / 279	
文字教育的效率	
——民校毕业生再测验的结果 / 282	
✎ 姚石庵 / 285	
农村经济建设必由之路 / 285	
✎ 陈志潜 / 288	
乡村卫生的基本困难及其补救方法 / 288	
唯一的出路 / 290	
✎ 陈筑山 / 293	
平民公民教育之计划 / 293	
✎ 汤茂如 / 299	
平民教育运动的经过 / 299	
✎ 傅葆琛 / 308	
农村社会的改造与民众教育的实验 / 308	
✎ 黄炎培 / 314	
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 / 314	
《农村教育》弁言 / 317	
中华职业教育社农业教育研究会宣言书 / 318	
与安亭青年合作社谈乡村事业——讯合作记者 / 319	
怎样办职业教育（节录）	
——敬告创办和改办职业教育机关者 / 321	
从六年半的徐公桥得到改进乡村的小小经验 / 323	
✎ 江问渔 / 329	
两个名词的解释 / 329	
关于乡村改进问题的解答 / 331	
富教合一主义 / 335	
《试验六年期满之徐公桥》序文 / 338	
农村改进与农村教育 / 341	
关于农村教育的三个重要问题 / 352	

姚惠泉 / 362

农村改进与中国前途 / 362

农村改进罪言 / 364

陆叔昂 / 366

农村改进之路 / 366

训练农村民众的先决问题 / 368

一个复兴农村的方案 / 369

徐公桥乡村改进区概况 / 370

高践四 / 375

民众教育的意义 / 375

民众教育与乡村建设时期 / 383

农民教育馆之三要 / 386

农村建设方案 / 387

江苏省各县县单位乡村民众教育普及办法草案 / 389

我们认识中之乡村建设 / 395

乡村建设具体方案之讨论 / 397

加紧乡村工作的必要 / 401

陈礼江 / 404

什么是乡村教育 / 404

中国乡村教育运动 / 406

现阶段中国乡村社会的急迫问题 / 408

乡村教育的新趋势 / 410

民众教育与乡村建设 / 411

乡村教育与乡村运动 / 416

乡村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 / 420

赵 冕 / 424

关于乡村运动的讨论 / 424

参考文献 / 427

乡村建设派评介

民国时期是处于社会转型的剧变阶段。在外来帝国主义、清末残余封建势力、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及新式军阀等多股政治势力的共同作用下，民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子系统都在急剧地变化并相互作用。民国的各种政治家，一方面通过相关的政治思想理论表达本阶级的政治诉求，另一方面积极地进行政治实践活动，使这一时期的政局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乡村建设运动就是这一时期政治与社会转型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20世纪30年代由知识精英推进的以乡村教育为起点、以复兴乡村社会为宗旨的乡村建设运动盛极一时。

从事乡村建设运动者被视为乡村建设派，通常认为乡村建设派下有五个分支流派，即：村治派、晓庄生活教育派、定县平民教育派、中华职业教育派和无锡民众教育派。^①其中，在地方自治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村治派是乡村建设运动的源头，受该派影响又独有创见的梁漱溟是乡村建设运动的执牛耳者。以陶行知为首的晓庄生活教育派和以晏阳初为首的定县平民教育派在乡村平民教育上则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以黄炎培为首的中华职业教育派和扎根无锡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也在乡村民众职业教育和乡村民众思想启悟上开辟了一番新景象。当然，在乡村建设蔚为风气的历史环境下，主张或参与乡村建设、乡村教育的流派和人物并不仅限于此，许多大学教授、地方官员甚至有一定声望的商人如卢作孚等也都参与了这场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尽管如此，在当时，仍以上述五派思想最成体系，也影响最大。

这场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曾持续了十余年之久，波及中国中东部的广大地区，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深远影响。它在一定程度上复兴了中国乡村社会，缓阻了中国乡村社会的衰败过程。但从本质上来说，乡村建设运动只是一种社会改良运动。乡村建设派希望用和平的、非暴力的手段建设中国乡村，刷新中国政治，复兴中国文化，带有明显的改良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尽管他们的举措可能不尽成功，但他们对乡村建设所提出的种种主张和所做出的艰辛努力，对于后人尤其是今天从事乡村建设者依然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① 参见董宝良、周洪宇主编《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潮与流派》，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63—485页。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当时国民政府、共产党、各类社会团体以及普通大学教授等组织的其他乡村建设派别，共计11种（曹天钟：《乡村建设派分概念形成史溯源》，《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但以此五派成效最大，影响最深。故此仅选取此五派文献加以整理。

中华报派和村治派

乡村建设最早起源于清末民初河北定县米鉴三、米迪刚父子在其家乡翟城村仿照日本模式创办“模范村”所进行的提倡自治、普及教育、改良农业、移风易俗等建设活动。米迪刚既是翟城村自治的实行者，也是乡村自治思潮的首倡者，他创办了《中华报》和《村治月刊》两份报刊，并以这两份报刊为核心，先后形成“中华报派”和“村治派”乡村自治流派，成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报》创办于1924年3月，至1925年12月因资金短缺停刊，历时近两年。米迪刚、王鸿一、尹仲材等人在《中华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提倡乡村自治、普及乡村教育、改良乡村农业、提倡乡村移风易俗的文章，试图以乡村自治方式完成乡村改革，继而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伟业。他们之所以揭橥乡村自治，主要是因为：

（一）清末民初地方自治运动的推动。清末新政揭开了近代地方自治运动的序幕，也使得传统士绅阶层获得了参与地方事务管理的权利。^①米鉴三、米迪刚父子作为当地富甲一方的大乡绅，更是积极参与了翟城村的革新活动。尤其是米迪刚，曾作为定州首批留学生于1903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在留日期间，日本乡村社会的高度组织化和乡村社会各项事业的发达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1908年，他学成归国后，即开始仿照日本制度，对翟城村各项事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②

（二）对中西文化思考和比较的结果。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基本以西学为是，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弊端的暴露，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审视中西文化问题。例如，米迪刚就认为中国文化和欧美文化脉络根本不同，不能混淆同一：中国文化已历经四千多年而不衰，是最优秀的文化；欧美文化不过只有几百年，社会基础至近且浅，更面临不可调和之矛盾而无法发展。一战就是西方文化走向死胡同的表现。因此，他们反对不参照中国国情就照搬西方制度的行为，认为这是“橘变为枳，迁地弗良”；^③他们主张从中国国情出发，在中国人固有的国性民情基础上寻求政治出路。中国既处农业社会，以农立国，自然应在农村立足，实行乡村自治。

（三）对儒学实学和上古文化的推崇。米迪刚等人服膺颜李学说，^④故一直以来都

^① 虽然清政府规定士绅参与地方自治事务仅限于公益事业，但实际士绅参与范围往往远超过公益事业，从而引发乡村社会的某些变革。

^② 由于清政府规定下级自治单位体为城镇乡，所以清末翟城村只有各项自治事业的发展，而无村治制度上的变革。直到1915年国民政府内务部重新推行自治后，翟城村才取法日本模范町村，实行村自治。

^③ 王鸿一，《建设村本政治》，载《村治月刊》1929年，第1卷第1期。

^④ 颜李学说，清初的实学学说，因创始人颜元、李塨而得名，提倡实学实用。米迪刚、尹仲材一直服膺颜李学说，王鸿一最初重程朱，后因程朱空疏、不切实际而转向颜李。

欲提倡颜李“经世”学说，作为复兴中国之路；而颜李学说对于上古文化的推崇，更促使他们从上古文化中为自己寻求理论依据。他们认为上古时代孔孟对于村治皆持重视态度，如孔子有“吾关于乡，而知王道易易”，孟子有“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的说法；只是秦汉以后县治发达，才使民治精神尽失，造成官治国家而遗祸无穷。而且古今“家”、“国”范围也发生变化，“国”的范围逐渐缩小等同今之“乡”；所以“于大学八条目中，‘齐家、治国’之外，加入‘亲乡’一条”，^① 才算是对上古先贤圣哲遗志的继承，才能使中国走上治平之路。

基于以上原因，中华报派不但在翟城村实施了具体的村治改革，还拟定了一套以村治为核心的国家与社会改良方案。其要点如下：

（一）确立民主传贤政体，建构以村治为基础的国家与社会体系。即以村治为单位，选举一县中最贤能的村长为县长，选举一省中最贤能的县长为省长，选举全国中最贤能的省长为总统。他们认为，实行传贤政体，就可以使知识分子由“求名于朝”改为“求名于野”；那么，农村自会发展，国家稳定和社会长治久安也会不期而至。而要实行民主传贤政体，“又非先有略具教养雏形之全国划一组织之村治不为功”。^② 所以，要实行民主传贤政体，先要有划一的村治组织。

（二）政府发挥职能作用，促进村治构建。他们对政府提出了三个建议：第一，设立村治育才馆，以乡制古意，结合翟城村、山西、云南等地的村制成规编辑教材，进行村治教养。第二，颁行划一全国的村治条例。第三，改良钱粮纳税向例，作为村治经费后援。即令效法翟城村，组织纳税组合；由县村会直接汇解省财政机关例收的地丁总额。

（三）规划村治具体方案。他们认为，村治应以人口 2 000 至 4 000 人为标准，以旧有村落或联合相邻几个村落共同组成。每村举村长一人，兼充村学师，负责以下重要事项：（1）议定村治组织大纲、户口登记法、清理地产权法、村治考绩章程及村治大比宾兴章程。（2）组织村公所与村议事会。（3）管理公产，组织因利协社、纳税组合、义仓等。（4）劝农，组织农业会、农产物制造物品评会、防除害虫会、农家副业组合、水利或沟洫或凿井组合，制定看守禾稼、保护森林等项规约。（5）普及教育，制定教育普及计划书，成立教育会、国民高等小学校、女子国民高等小学校、半日学校、村治讲习所，设立宣讲所、图书馆与阅报室，组织乐贤会、教育费贷用储金会。（6）改良风俗，组织德业实践会、风俗改良会、辑睦会、查禁财博会。（7）改善环境，建立

^① 米迪刚、尹仲材：《翟城村》，中华报社，1925 年，副刊第 77 页。

^② 米迪刚、尹仲材：《翟城村》，中华报社，1925 年，第 217 页。

卫生所、医院（可联村设立）、公共浴室、公园，制定平治道路、共同保卫等事项。

中华报派的上述建国主张和村治方案，一方面将村治置于国家与社会的基础地位；另一方面又立足于翟城村自治模式，并结合山西村制的某些长处，使村治制度更加理想化。从总体上说，中华报派的主张是“五四”以后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中国乡村出路的一次有益探索，它上承儒学实学思潮，下启民国村治思想，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实应占据一定位置。但由于军阀割据混战，中华报派的村治方案除在翟城村获得小范围的实践外，在全国并未引起广泛的回应。

进入 20 世纪 20 年代末，随着国民政府北伐胜利，全国统一遂见告成；对于如何实践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国人一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原中华报派的米迪刚、王鸿一、尹仲材等人又活跃起来。1928 年初，他们开始筹办《村治月刊》社，次年 3 月正式发刊；该社由王鸿一任社长，吕振羽任总编辑。这样，以《村治月刊》社为中心、以王鸿一为首，又形成了一个宣传研究村治的新团体，他们通常被人们称为村治派。该派除了原中华报派的王鸿一、米迪刚、尹仲材等人之外，又新增了梁漱溟、^① 吕振羽、彭禹廷、茹春浦、杨天竞、王惺吾等人。可以说，村治派基本是由中华报派“改头换面”而来。

所谓“改头”是指在新的政治环境下，米迪刚、王鸿一、尹仲材等人对原有的政治主张进行了新的包装，三民主义成为其高扬的旗帜。在这里，除了坚持原有的村治方向不变，他们还针对现实，提出了四个亟待讨论的新问题：（1）如何继承中国固有文化精神，并兼融世界其他民族文化优点，建立起复兴中华民族的新文化。（2）如何实行村本政治，将政治重心移至下层，建立民众直接参与的政治活体，以实现乡村经济的改良、教育的普及和民众的训练。（3）如何进行移民实荒，巩固边隅，融和文化，调剂人口。（4）如何振兴水利。他们指出，提出上述新问题的目的，是“希望我民族的新文化能够树立；真正民主的精神，在民权主义的原则之下，从村本政治中表现出来；垦务和水利，在民生主义的原则之下，见诸事实。”^② 三民主义思想的加入，使村治派的思想较原中华报派有了历史性的进步。

总的来说，无论是村治派还是乡村建设派，都对民国时期的乡村改造做出过重要贡献。但由于他们都否认农村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所以他们的侧重点都只在伦理教养、技术改良、移风易俗等细枝末节上，并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他们最终只沦为一种社会改良思潮，没能完成对民族和国家的拯救。

^① 对于梁漱溟是否属于村治派，学术界有一定的分歧。有人认为，梁漱溟不是村治派的一分子。在这里，采用学术界一般的看法，将其看做村治派的一员。

^② 《发刊词》，载《村治月刊》第 1 卷第 1 期，1929 年。

乡村教育思潮

乡村教育思潮是“五四”后兴起的一种教育思想潮流。当时，中国一些教育家和教育团体纷纷提倡乡村教育，先是在报刊上发表言论，进而下乡参观访问，后来开展乡村教育试验，逐渐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乡村教育运动。他们将教育中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一心要使广大农民及其子女受到教育。这是中国教育主要重视在城市办学的历史性转折，也是民国乡村改造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乡村教育思潮之所以勃兴于“五四”时期，主要是因为：一战后，帝国主义侵略加剧，封建势力盘剥加重，农村不堪兵匪豪绅蹂躏，日益衰败，乡村改造和乡村建设亟待进行；农民遭受各种压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自知，知识分子欲开展农民运动，必须唤醒农民觉悟，推行乡村教育势在必行。此外，乡村教育的勃兴也与西方国家对乡村教育的重视密切相关。当时乡村教育的提倡者，如陶行知、晏阳初、赵叔愚、傅葆琛等人都是留洋归国学者；中国赴美教育考察团回国后也对乡村教育极力肯定，大力提倡。

当时从事乡村教育的力量很多，无论是教育家、教育团体还是其他热衷于乡村教育的学者和团体，数量都空前绝后。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1935年全国有各种乡村教育、乡村改进和乡村建设试验区193处之多。这些大大小小的试验区，将波澜起伏的乡村教育思潮汇集成了一股股乡村改造和乡村建设洪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试验区，主要有四处：生活教育派在南京郊区创办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平民教育派在河北定县创办的乡村建设实验区；职业教育派在江苏昆山徐公桥创办的乡村改进实验区和前文提到的乡村建设派在山东邹平创办的乡村建设试验区。

生活教育派

生活教育派是乡村教育思潮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派别。它以生活教育为指导，从事乡村教育，进行乡村改造和乡村建设，为中华民族创造新生命。生活教育派认为，“办学和改造社会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主张以乡村教育改造乡村社会。生活教育派的核心人物是陶行知，他在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从事教育改进的过程中，产生了“平民教育下乡”思想。^①1927年3月，陶行知创办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此期间提出生活教育理论，形成生活教育派的核心思想。1934年2月，《生活教育》创刊，正式形成以陶行知为首的生活教育派。1938年12月，生活教育社在桂林成立，陶行知任理事长，王洞若、方与严等任常务理事，生活教育派的组织也建立起来了。

^① 陶行知：《平民教育下乡》，载《陶行知全集》第5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